

17
现代国际关系译丛

苏联的新政治思维

本社选编



时事出版社

现代国际关系译丛（十七）

苏联的新政治思维

本社选编

时事出版社

现代国际关系译丛（十七）

苏联的新政治思维

本社选编

•
时事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万寿寺甲2号）

涿州市范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 字数：95000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

ISBN 7-80009-030-2/D·16 定价：1.40元

编者的话

80年代中期，“新政治思维”这一概念便在苏联领导人的言论中出现。此后，苏联学者、政论家、理论工作者即开始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论述这一概念，引起世界各国愈益广泛的关注。本辑从近两年来苏联发表的大量论文中选出了十篇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文章，内容涉及时代特点、外交新哲学、国际关系理论、裁军新构想、军事战略思想等。从中可以看出，苏联学术界研讨“新政治思维”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预计，这种讨论今后还会继续深入下去。苏联是一个重理论、重“思想先导”的国家，阅读和研究苏联学者的论著对我们跟踪苏联学术界的理论动向，特别是对了解和把握苏联内外政策的走向均有帮助。由于翻译和编选水平有限，错误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1988年3月

目 录

核时代要求人们具有新的观念·····	A·鲍文 (1)
新思维新观点·····	E·普里马科夫 (10)
论新政治思维·····	B·阿法纳西耶夫 (14)
对外政策新哲学·····	E·普里马科夫 (21)
战争与共产党的愿望根本相对立·····	B·扎格拉金 (28)
核裁军新构想·····	O·贝科夫 (41)
国际关系体系的演变·····	E·波兹尼亚科夫 (56)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问题·····	Ю·诺沃帕申 (72)
论合理实力限度·····	B·茹尔金等 (90)
和平共处与新思维·····	A·尼基福罗夫 (106)

核时代要求人们具有新的观念

A·绝 文

我们身在其中的世界不断变化。我们对世界的思考也在变化，不过人们的思想往往赶不上世界事物的发展。这个道理相当简单。然而，一旦把这个道理置于政治风暴的中心，就不那么简单了；一旦在通向重建缓和气氛、裁军的道路上，在协调世界各国、各国人民之间的建设性、创造性活动的道路上出现了主要的精神障碍与心理障碍，即人们不善于或者不愿意按照核时代的要求进行政治思考时，这个道理就不那么简单了。

世界变化的性质与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政治观念的改变，取决于人们对核时代现实情况理解的深度。

1945年7月16日清晨5时30分美国人在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多试验场爆炸了第一枚核装置。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称这颗原子弹的爆炸为“基督再次降临”。过了不到一个月，8月6日和9日，由于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了一道命令，广岛和长崎遭到毁灭。

人类进入了核时代。最初只是个别一些人，首先是一些学者，一些与这几枚原子弹的研制有关的学者懂得这一事件的真正意义。政治家和将军们仅能理解“以往的战争”。按照他们的观点，核武器改变了战术，改变了战略，但并未触动战争哲学；依照传统观念，总是把战争视为完全理智的、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一切都与以往大同小异，只是规模有所不同而已。然而，核

本文原载苏联《共产党人》杂志1986年第10期；作者为《消息报》政治评论员。

时代逐渐显示了自己的威力。随着毁灭广岛、长崎的灾难性事件的后果逐渐为世人所知，随着一次又一次新的核武器试验传给人们越来越多的信息，更主要的是随着新的巨大毁灭性武器威力的增强，人们越来越清楚，核武器的制造贮存意味着向新的历史时代的过渡。在这个新时代，人已经取得了毁灭整个人类的技术手段。

人类掌握了自我毁灭的能力，于是，许多习以为常的政治、军事战略方面的思维模式大大贬值，甚至变得毫无意义了。20世纪伟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说：“为使人类存活和继续发展，人类必须以新的方式思维。今天，原子弹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我们知道人类已处于一个新的环境，人类的思维应当适应新环境。”

核武器无与伦比的巨大毁灭力决定了新环境的特点。核爆炸时，在核冲击波、光辐射、贯穿辐射与放射性沾染的共同作用下，人是无法抵御的。学者们的计算表明，对于一个100万人口的城市，如果投下一枚百万吨级的核弹，第一天将有31万人死亡，38万人需要医治（实际上不可能得到救治）。需说明的是，上述计算是指仅有一枚核弹爆炸。如果是核战争中的密集对射，又当别论。况且，目前世界核武库之威力约达130~150亿吨，其可能导致的损失、毁灭与痛苦之大是人类理智难于设想的。

核战争的潜在威力确实能毁灭人类文明，首先是摧毁全人类的理智生活。80年代人们了解到，核武器对人们的威胁不仅在于它的直接杀伤力。苏联和美国的研究表明：密集性核打击会向大气层扩散大量尘埃及浓烟，致使地球骤然变冷（“核冬天”）。与此同时还会发生不可逆转的生态变化，生态环境将遭到灾难性毁坏。联邦德国的普朗克学院化学教研室主任P·克鲁岑指出：“相互的核攻击结束后，数公里厚的黑云遮蔽太阳，地球上的黑暗与寒冷将持续几个月之久。即使在白昼，幸存者也会伸手不见五指。因原子冰冻，所有河流湖塘均凝结，动物与庄稼灭绝。任

何人也无法熬过这种长久寒冷的黑暗时期。”也许，上述观点有失偏激。不过，无论如何，不管核爆炸发生在什么地理位置，有害的生态后果将遍及全球，从而威胁整个人类。

有人会提出异议：严格说来，上述情况仅仅是假设。然而，既然说的是大规模核战争，我们假设它带来的是“无限的”灾难更为合理。此外，在估量错误所带来的后果时，作最坏的设想更接近真实情况。

战争打了数千年，一些国家灭亡了，人类文明被毁坏了。但人们总是指望另外时代的到来，指望必将到来的新一代……人总是要死的。但人类将一直延续下去——人类在历史上的一切作为都曾以这一点为前提，只不过这个前提不那么明确，可以说是存在于潜意识中。尽管曾有尸骨成山血流成河的场面，然而历史恰是经历这种场面跨越向前的，于是迎接了一个又一个未来。如今，肯定无疑的未来已不复存在。这一划时代的转折，把历史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以往，是对个别人提出“存与亡”的问题，如今这个问题提到整个人类面前了。引起核战争的错误或者罪行，可能成为最后的错误、最后的罪行。

西方有些人认为，核战争的发动者总要担心不可避免的报复，从而产生同等恐惧，这样就减少了“大战”的可能性。但是，依我们的观点，核战争的灾难性后果要求人们重视“微乎其微的或然率”。遏止核发展与同等恐惧不能阻止核战争，不能排除偶然的、始料未及的战争突发的可能性，这种战争，特别是在相互冲突的、危机四伏的时刻，可能由于种种原因而引燃。加之同等恐惧受国内不稳定因素的制约，有其内在的矛盾，有超出常规的可能。同等恐惧必然产生同等不信任。这样，每一方都在考虑：对手采取最劣的行为时我方将如何动作。于是，互不信任的、疑虑重重的绳结会越勒越紧。

核时代要求人们对老问题和新问题都要持重新审视的态度。

首先，核时代要求人们以新的观念来看待战争与政治之间，确切地说是核战争与政治之间的联系，来评价习以为常的一些观念。

我们先看看核时代以前的经典公式。按照克劳塞维茨的观点，“战争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他写道：“在所有情况下，我们都不应把战争看作是某种独立的东西，而应把它看作是政治的工具。”这里，克劳塞维茨说得过于笼统，而且未作时间的限定。照他看来，任何战争——大的、小的、核战争、常规战争——过去、现在、将来，无论其后果如何，破坏力所及范围大小，毁灭人数多寡如何，都是政治的继续。为了达到既定的政治目的，或采取和平手段，或选择武力解决的办法，两种手法均可奏效。正是在这里，克劳塞维茨的观点过时了。对于手中握有核武器的政治家来说，上述选择是不存在的。因为一个政治家打一场威胁人类未来本身的核战争是毫无意义的，通过这种战争无法达到既定的政治目的。在任何条件、任何环境下核战争也不能被视为理智的选择和达到政治目的合理手段。

过去和现在，人们为什么要打仗？因为在发动战争的一方和被迫抵抗的一方看来，都认为有一种比和平更为重要的东西。一些人——为了权利和财富；另一些人——为了独立与自由。

然而，如果在战争中不能取胜呢？如果一场战争将没有战胜者，而有两个战败者，那将如何？如果首先挑起战争的一方，随后便成为第二个灭亡者，那将如何？一接触这些问题，从前的价值尺度便失去作用。若是抽象议论，可以说核战争也可能成为正义的战争，即正义在回击者一方，但是这纯属无意义的空泛之谈。因为正义和非正义之区别仅仅对于活人才有意义，对于可延续的历史才有意义。

美国正在积极制定各种类型的“有限核战争”计划。他们提出的任务是：限制核攻击的规模，避免不可控制的战争行为的升

级，依靠美国的优势在对美国有利的条件下结束战争。

针对这种情况，戈尔巴乔夫曾说：“看来，那些高谈阔论‘有限的’、‘快速的’或者‘持久的’核战争的人，时至今日仍然拘泥于早已过时的模式。从前，战争仅仅是大灾难，而不像今天这样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核时代不可避免地迫使人们接受新的政治观念。”

对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持批评态度的人正确地指出，战略防御计划的实施，导致形成“措施——反措施——反反措施”的恶性循环，势必加剧军备竞赛，使竞赛在质量上升级，最终使军事对垒愈加严重。

如今，单方面的安全，以及由某种军事技术“奇迹”（例如战略防御计划）所保证的安全，实际上是不可想像的。苏联安全的钥匙，不仅收藏在莫斯科，而且收藏在华盛顿；同样道理，美国的安全不仅仅由华盛顿的所作所为来保障，而且由莫斯科的所作所为来保障。结论是极其明确的：谁打算通过削弱对手的安全来加固自己的安全，谁就必然削弱自己的军事战略地位。

在分析当今现实时，不能不考虑历史时代的特点和社会历史环境的特点，不能不考虑如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国家。无疑，帝国主义的本性包括极力对世界进行经济、政治的瓜分和再瓜分。但是，比起本世纪初，今天的瓜分企图表现为另外的形式。同样不容置疑的是，帝国主义的本性还告诉我们：可能爆发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然而，20世纪末爆发此类战争的可能性实际上等于零。因此，有理由设想，帝国主义对世界形势的变化会作出反应的。

资本主义世界一些持乐观态度的思想家认为世界事态的发展将有利于资本主义。他们勾画出这样一幅前景：在科学技术革命新浪潮的基础上，资本主义世界的传统中心正在实现进一步的现代化；资本主义的“社会责任”在增长，这种责任将消除阶级对

立；在上述进程的影响下，在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里将确立资本主义关系；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中市场原则将起越来越大的作用，这将逐渐导致政治制度的相应演变。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得出的“结论”是：这样一来，作为一种体系的、与资本主义鲜明对垒的社会主义将逐渐“泯灭”于历史之中。

上述观点中尽管有许多谬误，但仍未能排除新的政治观念包括的论断，未能排除巩固和平共处与合作，未能排除拯救人类免于核危险的论断。

对我们来说，和平共处不是策略问题，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期的战略。它是核时代唯一理智的战略。至于说对资本主义的削弱，我并不认为，例如，我们同法国或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稳固经济合作会削弱这两个国家的资本主义。我们的时代还存在一种似乎反常的现象：属于对立体系的国家，为达到存活并继续进行争论之目的，不得不为了双方的利益而相互合作。正值美国为此种现象焦躁不安时，正值那边竭力限制对苏贸易的时候，却在无意之中证明他们陷入了因循守旧的过时观点的泥淖，他们不理解时代，不知道自己能力的限度。历史的争论还会继续下去。核时代的主要要求是：不要以核弹作为论据，不要以武器作为论据，而要以经济和文化的成就作为论据。

“自己活，也让别人活”——这一简单而平常的规则如今成了核时代的一句格言。我担心，华盛顿还没弄懂这句格言。我们不能猜测美国的政治家、战略家头脑中在想些什么。我可以试作设想，里根甚至温伯格不打算同苏联打仗。但与此同时不能不考虑白宫的军事政策客观上朝着谋求第一次打击的技术能力的方向进发。不考虑这种能力无论如何是不行的。据我所知，美国人自己就是从这样的立场来估价苏联政策的。于是，持续不断的军备竞赛甚至在保持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导致相互猜疑日渐增长，使潜在的相互不信任加剧，也就是说，导致均衡状况本身遭到破坏。

出路只有一条：制止军备竞赛，着手切实的裁军。不过，要想做到这一点，即达成稳固的、范围较广的、解决根本问题的协议，就必须创造一种环境，使外交活动的方法、风格、性质从总体上改变，这种改变须能反映核时代的迫切要求。

其中，有这样一个要求：学会理解和考虑谈判对手的合法利益。这项学问可不简单。它首先要求人们善于把握世界的整体，同时还要善于站在对手的立场来审视自身。它还告诉人们必须经常对比自己的愿望、要求和对方的愿望、要求。它要求人们不仅仅把注意力集中于划分竞争利益（就原则而言这是无可厚非的），而且更多地集中于寻找能使这些利益走向一致、相互交织或者并行不悖的领域。

考虑相互的利益，这是形成妥协性的、相互可接受的协议的出发点的基石。在对手实力相当时，只有这样的做法才是可行的。妥协乃是清新的空气，没有它，建设性的政策将会窒息。两个对手若想在谈判中有所前进，每一方都要向后撤，即为达成协议各自牺牲部分预定达到的要求。当然，每个对手的让步都有限度，这个限度是由国家安全的最高利益和盟友义务所决定的。同时，实践表明，捍卫极其重要的立场时所需的坚定性（假设这一立场是正确的）并不排斥较大的灵活性，也不排斥在大大小小的问题上游刃有余、随机应变。

寻求妥协的方针，这与提出最后通牒式的要求、坚持不可更改的条件之做法是不相容的。在双方权益与实力相等的情况下，采取最后通牒式的做法，首先限制了持此态度的一方。最后通牒式的做法使立场僵化，妨碍人们考虑情况的变化，割断本可回旋的线路，从而失去修改政策的机会。因形势所迫或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不得不放弃最后通牒式的做法，这在实质上是有益良策，但从表面看，从形式看似乎是退却、丢脸等等。不过，由于在政治中往往形式亦即实质，人们往往不顾最后通牒式做法所蕴含的

长期起作用的不利因素，而追求它带来的短期起作用的，主要是宣传上的好处。

最后，核时代迫切要求人们在所有外交活动中表现出更多的开诚布公、坦率爽直精神。乍一看来，号召少采取狡猾手段是一种痴心妄想。但在外交手段当中“狡猾”所占的比重应与所讨论问题的重要性与规模成反比。因为很难设想，在事关国家安全的问题上，谈判的任何一方肯使自己受“狡猾者”的愚弄。明确地阐述立场，把模棱两可、难以捉摸、各式各样让人如坠五里云雾的表态压缩到最低限度，乐于简练地介绍情况，解释引起怀疑的任何细节——所有这些明确表达政治意志的做法将有利于加速谈判进程。

严格地说，上述要求在外交史上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上面提到的每一种做法在核时代以前也在某种程度上存在过。但是，这些做法在以前更多是宣布、谈论，而没有受到重视。“应当”一词与“实际上”一词是大有区别的。如今重提这些要求，新就新在要使“应当”取得“实际上”的地位。事关人类的存亡，需下大的赌注，规则中的例外本该成为规则。

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看一下。为使新观念转为政治事实，变为政治现实，成为政治变革的源泉，应当使新观念变成新的外交活动，变成国际舞台上新的行为准则。为此，需把我们这个矛盾着的、分割着的、破碎不堪的世界看作是统一的世界、世界性的大家庭，看作是人类整体。尽管这个整体处于自我毁灭的威胁之下，但它已开始具有全球意识。认识到上述一致性，并不是完全勾销意识形态、社会利益的差异和对历史进程所持的哲学观、世界观的差异。然而，为了就历史哲学、就未来是什么样子进行争论，必须首先保证历史能够延续下去，必须保证有未来。我以为，这是举足轻重的论据，它证明：在这种情况下任何集团利益在全人类的共同利益面前均应退让。需要再次重复的是，美

国，更确切地说，当前代表美国讲话的一些人，至今尚未准备接受新的坐标系——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

严峻的现实不容回避。在核武器存在的情况下，就有可能爆发核战争。但是这种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政治的任务，当前摆在人类面前最主要的任务恰恰在于减少、消除核战争的可能性。而新的观念正是成功地实现这一任务的必要前提。新的观念清晰地表明：继续进行军备竞赛是极其危险的，它将导致毁灭的前景。新观念能唤起人们进行积极的、目标明确的、反对战争的活动。新观念能指导政治家们考虑相互的利益，使彼此对立趋于接近。

（李文厚译）

新思维新观点

E·普里马科夫

我们从来不需要国际紧张局势。当前，在我国正在落实进一步发展的宏伟任务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任何时候也没有像在苏共二十七大会上这样广泛地探讨国际事务问题。大会制定和提出了对外政策战略的要点，强调必须树立新观点、新政治思维。

这种在世界核对抗形势促使之下应运而生的新政治思维的含意是什么呢？

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第一点是：曾经有人着重指出一个统一世界的存在，这个世界在自己的发展中越来越紧密地相互联系着。我们也总是说对立的统一和斗争像开动着的发动机和火车头，但是，我们总是强调资本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体系的对立，却很少注意这两个对立面赖以发展的统一环境。现在我们要坚定而着重地指出，以全人类共同生存问题为基础的世界统一正在不断得到加强。但是，不能因此而满足。

关于世界经济，列宁早有论述，如今它正在发挥作用，尽管存在着各自独立的两个部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却是相互联系的。这种共同的全世界经济具有自己的规律，最终也毕竟会出现一系列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必须加以解决的

本文原载苏联《1986~2000：从和平年到和平世纪》，1986年；作者为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苏联科学院院士。

全球问题。

第二点，我们党坚决主张，必须改变那种以两大体系对立为背景的处理国际关系的态度。国际关系不可能成为决定世界社会主义和世界资本主义命运的场所。

无论在我们党的纲领中，还是在政治报告中，都非常明确地指出不允许把对外政策纳入意识形态的轨道。遗憾的是我们却常常看到与上述原则背道而驰的言行。例如，大家知道，美国领导人有一种说法，他们说存在着一个“凶恶的帝国”，还说，美国政策的矛头应当指向消灭社会主义体系。

第三点，也属于现代政治思维的新内容，这一点可以归结为：国际关系网络是由经常相互矛盾的各国的利益纵横交织而成。在这种条件下，政治家们和大国领导人的责任首先是寻求各国利益相一致的领域，并采取真正能够导致这些利益走向一致的行动。

第四点，对待社会政治变化的态度。我们大家都在注视着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变化。二十七次指出，当前世界变化特别大。各个国家都在发生着革命的、进化的、社会—经济的、政治的各种变革。如何对待这一发展过程呢？我们反对以任何形式从外部推进上述变革。我们知道不应当这样做，这种做法是徒劳无益的。我们党在自己的活动刚开始时，就采取这种立场，我们曾声明反对那些企图以军事的、人为的方法加速革命形势发展的人。今天我们再一次十分严正地、非常明确地声明，我们反对任何从外部推进任何建立在世界各国的客观基础上的社会经济或政治的变革过程。当然，这里所指的并不包括那种人为的、有意使社会发展停滞不前和原封不动的倾向。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不能把地区性的变革以及由各种原因导致的世界各个地区的突发冲突，一概视为苏美对抗的影响。

我们的观点同另一种哲学是相对立的。早在50年代，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提出了一种理论，认为在同苏联激烈的对抗下，一

切对美国不利的发展过程在世界某些地区都会形成真空。如果美国不以自己的影响去填补，那么，届时敌视美国的势力的影响必然会在那里得到加强。这一理论的余波至今天还反映在美国的政策中。我们可以明显地观察到，美国企图支持一些反对人民的政权，相反，却不断攻击那些奉行爱好和平政策和坚持反帝立场的国家。苏联建议美国放弃这种企图，不要仅以同苏联对抗的观点去处理世界问题。

最后一点，我认为这是新政治思维中最主要的一点，即有关安全问题的新构想。二十七大大明确指出，仅依靠军事技术手段不可能保证安全。这一结论是在对当前情况和未来前景进行周密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得出来的。

当前的安全是建立在苏联和美国、华约和北约之间军事战略均势的基础上的。戈尔巴乔夫同志在1986年1月15日的声明中所阐述的我们的建议，是主张把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排除在军事战略均势之外。这样，就会大大降低均势的水平。

这只是我们为之奋斗的一种可能实现的趋势。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另一种发展趋势。这种趋势是：双方本来指望的对等安全逐渐变为对等危险。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均势就不可能再起作用了，因为在军备竞赛均势水准无限制升高和对宇宙实行军事占领的条件下，将会出现政治活动无法控制的局面。例如，许多军事问题显然将听凭技术装备的摆布。而这种情况则可能导致最严重的后果。

因此，我们建议立即销毁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便抑制这种趋势的发展，最大限度地降低目前的军事战略均势。我想特别强调一下，二十七大大恰恰提出了全面国际安全体系的思想。这个问题的轮廓才刚刚显示出来。但是，我要提醒大家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在各个领域一起行动。不仅在军事领域，而且在政